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英〕汪濤 著
鄧曉娜 譯

顏色與祭祀

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義探幽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英〕汪濤 著
鄧曉娜 譯

顏色與祭祀

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義探幽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顏色與祭祀：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義探幽 / (英)
汪濤著；鄧曉娜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9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8976-0

I. ①顏… II. ①汪… ②鄧… III. ①顏色—文化史
—研究—中國—古代 IV. ①K22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09596 號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顏色與祭祀

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義探幽

[英] 汪濤 著 鄧曉娜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蘇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9.75 插頁 5 字數 236,000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100

ISBN 978-7-5325-8976-0

K·2546 定價：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編委會

總策劃：朱淵清 陳 致

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朱淵清

[美]李 峰

[英]汪 濤

[美]張立東

陳 致

[日]高木智見

唐際根

曹 峰

叢書序

“早期中國”是西方漢學(Sinology)研究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範疇，指漢代滅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國研究，或是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研究，此一時期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體系。以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於 1975 年創辦 *Early China* 雜誌為標誌，“早期中國”這個學術範疇基本確定。哥倫比亞大學近年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早期中國”命名。

“早期中國”不僅是西方漢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實用分類，而且是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實質性概念。

從最初的聚落發展到廣大地域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秦帝國建立，並且在漢代走上農業文明之路、確立起帝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完善科層選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標準，早期中國經歷了從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早期中國不僅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也孕育、塑造了此後長期延續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編戶齊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穩定維繫；商人的社會地位始終低下；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漢化，帝國疆域的擴張主要不是軍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結果；各種宗教基本不影響政治，世俗的倫理道德教化遠勝超驗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導的價

值觀體系以及由此造就並共同作用的強大的官僚制度成爲傳統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力量，等等。追源這類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歷史選擇形態(動因與軌跡)，對於重新審視與釐清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歷程，乃至重新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觀體系，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國研究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重心，長期以來，也是中國學術研究中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國研究在中西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這就是：擴充研究資料、豐富研究工具、創新研究技術，多學科協同不斷探索新問題。

1916年，王國維以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與《史記·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一一對照，發現《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絕大部分出現在卜辭中。王國維把這種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證的研究方法稱爲“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

出土文獻資料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研究中顯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 100 年來約出土 15 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 34 844 片。青銅器銘文，1937 年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金文總數 4 831 件，其中絕大部分爲傳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錄資料到 1988 年止，共著錄了金文 11 983 件。此後到 2000 年，又有約 1 350 件銘文出土發表。最近二三十年，簡帛文獻資料如銀雀山簡、馬王堆帛書、定州簡、阜陽簡、郭店簡、上博簡等都以包含大量古書而深受關注。

嚴格地說，王國維所說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還

是文字資料，這些發現當時還不是考古發掘的結果，研究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學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證據。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張結合文獻考證與文物考證，擴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立刻開始發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請發掘殷墟的報告中說：“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從1928年10月開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進行了15次發掘，發掘地點共11處，總面積46000餘平方米，這15次發掘收穫巨大：在小屯北地發掘了53座宮殿基址。在宮殿基址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約1公里處的武官村、侯家莊北地發現了商代王陵區，發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東南約1公里處的高樓莊後崗，發掘出了疊壓的仰韶、龍山和殷三種文化層關係，解決了華北地區這三種古文化的相對年代。在後崗還發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區，如大司空村等地還發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學發掘舉世震驚。中國考古學也從開創之初就確立了鮮明的為歷史的特色和風格。為歷史的中國考古學根植於這塊土地上悠久傳承的豐富文化和歷史知識的積澱，強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終支撐着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近50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無比巨大的成就，無論是新石器時代城址還是商周墓葬的發掘，都是早期中國文明具體直觀的展示。

不同來源的資料相互檢核，不同屬性的資料相互印證，提供我們關於早期中國更加確切更加豐富的信息，能夠不斷地解決舊問題提出新問題，又因為不斷提出的新問題而探尋無限更多的資料，而使我們對早期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入愈益全面。開放的多學科協同的綜合研究使早期中國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對其他歷史研究和學術研究來說，早期中國研究的這種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或

許也有其可資借鑒的意義。

王國維、傅斯年等人是近現代西方科學思想和知識的接受者、傳播者，他們的古史研究是現代化的科學研究，他們開創了中國歷史學和中國學術的新時代。現代中國學術的進步始終是與西方學術界新觀念、新技術、新方法的傳播緊密相連的。西方早期中國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評研究等等，啓發帶動着中國同行的研究。事實上，開放的現代學術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識背景學者的不斷交流、對話中進步。我們舉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斷代工程斷代的一個重要基準點是確認周懿王元年為公元前 899 年，這是用現代天文學研究解釋《竹書紀年》“天再旦於鄭”天象資料的一項成果。這項成果的發明權歸屬韓國學者，在斷代工程之前西方學界已確認了這個結論。將“天再旦”解釋成日出前發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現象的假說是中國學者劉朝陽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隨後的董作賓先生分別推算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韓國學者方善柱據此假說並參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論證“天再旦”記錄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環食（《大陸雜誌》51 卷第 1 期）。此後，1988 年美籍學者彭飈鈞、邱錦程、周鴻翔不僅也認定“天再旦”所記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環食，並對此次日食在“鄭”（今陝西省華縣， $\lambda = 109.8^{\circ}\text{E}$ ， $\varphi = 34.5^{\circ}\text{N}$ ）引起“天再旦”現象必須滿足的天文條件，第一次做了詳盡理論分析和計算，並假設食甚發生在日出之時，計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轉變化的相應的 ΔT 為 $(5.8 \pm 0.15)\text{h}$ ，將“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夏商周斷代工程再次確認了“天再旦”這一成果，並為此於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網實地觀測驗證。

本叢書不僅是介紹西方學者一些具體的早期中國研究的成

果，引進一些新的概念、技術、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個開放性的不斷探索前沿課題的學術交流對話的平臺。這就算是我們寄望於《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的又一個意義。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能通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時刻，願《早期中國研究》叢書能夠堅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們歡迎所有建立在豐富材料縝密分析基礎上、富有獨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國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長久的事業，我們只要求自己盡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來襄助。

朱淵清

2006/12/2

寫於學無知室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001
	第一節 顏色、顏色詞、顏色的象徵性	001
	第二節 殷墟考古發掘所見顏色和顏料	014
	第三節 甲骨卜辭釋讀的兩個問題： 書寫與讀音	030
	第四節 殷墟甲骨卜辭新的分類和分期理論： 貞人組和兩系說	047
	第五節 商代的祭祀與占卜	057
第二章	殷墟甲骨刻辭中的顏色詞	071
	第一節 釋“赤”	071
	第二節 釋“駢”	077
	第三節 釋“白”	081
	第四節 釋“勿”	084
	第五節 釋“戠”	089
	第六節 釋“黃”和“黑”	096
	第七節 釋“幽”(玄)	102
	第八節 總結：顏色詞及其分類	107
第三章	商代祭祀中的顏色	116
	第一節 殷人尚白	116
	第二節 神聖的駢牛	142
	第三節 勿色：傳統的轉變	153
	第四節 黑羊與祈雨之祭	167
	第五節 黃色與土地神靈	180

191	第四章	商代顏色象徵體系與“五行說”的發展
	第一節	商代的顏色體系：作為象徵符號的顏色
191		第二節 商代顏色象徵與“五行說”之關係
197		第三節 結語
205		
209	引書目錄	
234	附錄	
234	附錄一	“青幽高祖”新解：古代祖先崇拜裏的空間與顏色之關係
250	附錄二	顏色與社會關係——西周金文中之證據與闡釋
280	附錄三	《習簋》銘文中的“赤金”及其相關問題
297	後記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顏色、顏色詞、 顏色的象徵性

什麼是顏色？17世紀英國物理學家牛頓，用稜鏡成功分離出彩虹中的各種顏色，成為最早利用科學實驗來解釋顏色的先驅。目前，物理學家普遍認為，顏色是波長在400—700納米之間的電磁波能量的視覺化（圖1）。神經心理學家則認為，顏色是光波經過選擇性反射，在人眼和大腦上產生的一種視覺反映。有關顏色的討論，引發了科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藝術家以及許多業外人士的廣泛興趣，相關著述也十分豐富。^①除了色盲患者，普通人天生就具有觀察分辨事物和物體顏色的能力，但如何用語言來解釋顏色，仍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十九世紀德國文學家歌德，也是顏色研究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色彩論》是第一部專門研究顏色的著作。他批駁了牛頓

^① 有關顏色的更多討論，參看 F. Birren: *Color: A Survey in Words and Pictures*, Secaucus, 1963, esp. chap.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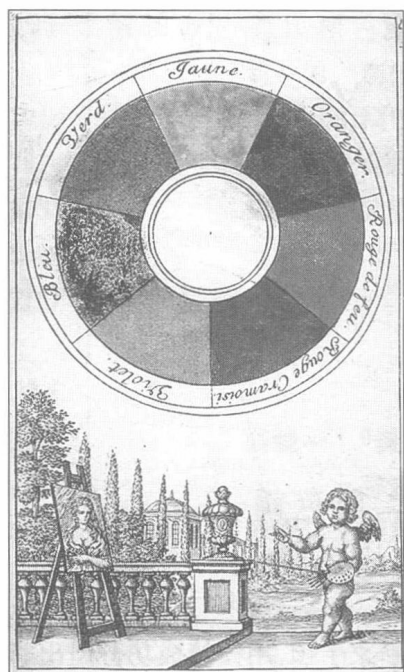


圖 1: 色譜

的“純科學”觀點，認為顏色也是人類視覺的產物，是大腦對外來信息處理的結果。研究顏色詞時所遇到的困難，可能是由語言本身引發的：

我們從未充分考慮過這個問題：嚴格來說，語言只是象徵的和比喻的，它從來不能直接地表達事物，只能間接地反映事物。古往今來，概莫能外。顏色尤其如此，它只能不完全地表露出來，供人觀察。或許我們更應稱之為“屬性”，而非“物質”。屬性在自然中變動不息。屬性變動不息，而我們又有必要描述它們。因此，我們極力尋找其中的規律，至

少也要對其進行象徵性的描述。^①

20 世紀的西方語言哲學試圖解決這個難題。才高命薄的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1889—1951)對顏色問題也情有獨鍾。寡言少語的他漫步在劍橋秀麗的風景中，反復思考着語言、思想與現實之間的聯繫：

倘若有人詢問什麼是紅、藍、黑、白，我們可以立刻指出帶有這些顏色的物體，然而我們的解釋能力也僅限於此！對於它們的

^① J. W. von Goethe: *Theory of Colours*, English edition, G. L. Eastlake, London, 1967, p. 300.

用途，我們一無所知，哪怕只是粗淺的、某種程度上錯誤的知識！^①


維特根斯坦哲學關注的是語言遊戲的規則和顏色的語法。他通過研究顏色以及藉助語言實現其功能的心智過程，試圖找到解答。他的最大貢獻就是揭示了顏色的相對性，即一種顏色（或者一個表示顏色的詞）如果脫離與其他顏色的聯繫，就會變得毫無意義。^②

本書的重點不是研究顏色的科學性或哲學性——此類著述繁多，有心的讀者可以找來閱讀——而是把顏色作為一種文化案例來研究。本書的研究材料是晚商甲骨文和其他考古發掘資料，研究目的是闡述顏色在特定文化語境中的象徵性和內涵，因而只在必要時候才提及顏色的科學性。此項研究有三個基本任務：（1）分析晚商（約前 1300—前 1046）甲骨文中出現的顏色詞彙，重構商代顏色分類的性質和體系；（2）分析顏色在商代祭祀卜辭中的使用情況，探究它們在特定文化體系中的涵義；（3）分析商代顏色體系的性質，探討其對後世思想，尤其是“五行說”的影響。本次研究將會加深我們對商代文化及其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的理解。鑒於研究對象和研究材料的複雜性，本文採用了多元分析法，不僅吸收了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吸收了語言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等的研究理論和方法。

本文首先分析了甲骨文中出現的顏色詞彙，即殷人對顏色感覺和知覺的原始表達。甲骨文中有八個常見的顏色詞：赤（紅色）、駢（橘紅色）、白（白色）、黑（或莖，黑色）、^③黃（黃色）、幽（或

① L. Wittgenstein: *Remarks on Colour* (ed. G. Anscombe, Oxford, 1978): I. 68.

② 對維特根斯坦顏色理論的哲學探討，參看 J. Westphal: *Colour: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 from Wittgenstein*, Oxford, 1987.

③ 該字在甲骨卜辭中寫作。該字有兩種不同的釋讀，但都可以用作顏色詞，意為“黑色”。更多討論將在下章進行。

玄,黑紅色)、^①𦉳(褐色)以及表示雜色的“勿”。學者對這幾個字的考釋持有不同意見,但都認為它們是基本的顏色詞。從甲骨文中識別出這幾個顏色詞並不困難,因為它們在傳世文獻中也多用作顏色詞。不過,同一個顏色詞,在不同時代所指的顏色範圍並不相同,顏色的內涵也因時因地而異。西方文化中就有類似的例子:希臘語中表示“火”的詞 pyr,與拉丁語中表示“赤紅色”的詞 burrus 是同源詞;它在羅曼語中有各種變體;普羅旺斯語中 burel 意為“褐紅色”,在古法語中的變體 buire 表示“黑褐色”;從 buire 衍生出表示黑褐色呢子桌布的 baize,又因政府辦公桌上都覆蓋這種桌布而衍生出表示政府機關的 bureau,從 bureau 又衍生出表示官僚體系的 bureaucracy。^②

由此可見,如果不瞭解顏色詞所在的分類體系,僅僅識別出它們並無多大價值。顏色分類因文化而異。許多語言學家都已意識到,同一個顏色詞,在不同的語言中就有不同的顏色範疇,相鄰的顏色之間並無嚴格界限。相反,即使一個顏色詞的內涵明確,其外延仍模糊不清。^③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哈樂德·考克林(Harold C. Conklin)所指出的:

因此,特定的顏色詞,當它表示顯著特性的確切範圍時,或許不該被局限到單一的範疇。然而,從一套相關詞彙同時出現的特定文本中,從它與其他並列詞彙如形狀、大小的對比

① “幽”和“玄”這兩個字在甲骨卜辭中或許還混而不分。現代漢語裏它們簡單定義為“黑色”;見《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306頁。可是,如果看《說文解字》(2世紀時編纂的字書,以下簡稱《說文》)中的解釋:“黑而有赤色者為玄。”有關該字的更多討論,將在第二章進行。

② 參看 D. Bolinger and D. Sears: *Aspects of Language*, New York, 1981, p. 266.

③ 參見 B. Comrie: *Language Universal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2ed edition), Oxford, 1989, esp. pp. 36 - 38.

使用中，或許就能找到顏色範疇存在的有用內在證據。^①

閱讀傳世文獻時，我們會經常發現它們對顏色詞的解釋相當混亂。不同的作者和注疏家，對同一個顏色詞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個人對同一個顏色詞的理解也常常因文而異。這種理解上的混亂，往往是由於他們沒有意識到顏色分類這個問題造成的。

我們不能忽視過去的研究成果和經驗教訓。早期西方學者對顏色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荷馬史詩經典文學的研究上。比如，19世紀中葉，四次出任內閣首相和財政大臣的英國政治家威廉·格萊斯通(William E. Gladstone, 1809 - 1898)，在一本著作中指出希臘史詩《伊裏亞特》和《奧德賽》中的顏色詞非常少，色彩的區分主要是明暗度的不同，真正表示白色、紅色、褐色、紫色等色度的詞很少，色度常用模糊的語言來描述。因此，格萊斯通認為在荷馬時代人們尚不能分辨顏色，顏色的現代概念是在較晚時期發展出來的。^②

無獨有偶，20世紀40年代，中國學者胡樸安也試圖解釋漢語顏色詞彙的發展歷程。他也認為顏色詞與社會的發展階段有直接關係。他的研究結果如下：最早出現的顏色詞是“白”，乃人臉的象形；其次是狩獵時代出現的“赤”，與火有關；再次是表示土色的“黃”，暗示了農業的興起；最後是文明時代出現的“黑”，代表炊煙。^③ 胡樸安的理論過於簡單，甚至有些幼稚，對真正理解顏色及其分類貢獻不大，因為它無法說明顏色分類在社會學或語言學上的任何發展。

顏色詞的多寡，與社會的發展歷程並無對應關係。認為古人的

① H. Conklin: "Color Categor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 75 (1973), p. 934.

② W. Gladstone: *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London, 1858, esp. pp. 457 - 499.

③ 胡樸安：《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本能與染色技術》，《學林》第3期，1941年，第53—67頁。

顏色意識不夠發達，因而顏色詞不夠豐富，這種簡單的進化論觀點早已過時。現代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都表明，顏料的使用在早期文明中相當普遍，狩獵或早期農業文明中的古人，很可能有一套豐富而複雜的顏色詞彙。如何了解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正是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重要任務。英國功能主義人類學家埃文思·普理查(1902—1973)曾經指出：語言的豐富程度取決於人們興趣的範圍和強度。他在研究非洲努爾人表示牛的詞彙時發現，對牛的命名主要根據牛的顏色和牛角的形狀。譬如，努爾人有十個基本顏色詞：白色(bor)、黑色(car)、褐色(lad)、栗色(chestnut)、茶色(yan)、鼠灰色(mouse-grey)、棗紅色(thiang)、沙白色(lith)，草莓藍色(blue and strawberry roan)和巧克力色(gwir)。純色的牛就用一個顏色詞來描述，而事實上常見的是雜色牛，則用多個顏色詞組合起來描述。^① 這跟我們後面要討論的商代甲骨文中的顏色詞彙有相通之處。

顏色研究的另一個難題是顏色的象徵性，即由此及彼的關係性。顏色常常來表達或象徵人的感情和情緒。人類對顏色的感知，常常通過類比與某種自然現象關聯起來。例如紅色使人們聯想到火和血；綠色喚起人們對樹木和自然的記憶。人腦對某種自然環境的反應也具有這種類比關聯性，只是這種類比關聯有時過於自發無緒，難以捉摸，以至於很難說它只是習慣性解釋的產物。另外，雖然現代心理學和生理學已經較為發達，但我們至今尚未真正明白人體肌體對顏色的反應過程。^②

儘管如此，我們仍可斷言，並且可以通過研究證明，顏色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類的身體和文化經驗，尤其反映了人類對

① 參看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1940, esp. pp. 41-48.

② 見 R. 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London, 1956, p. 275.